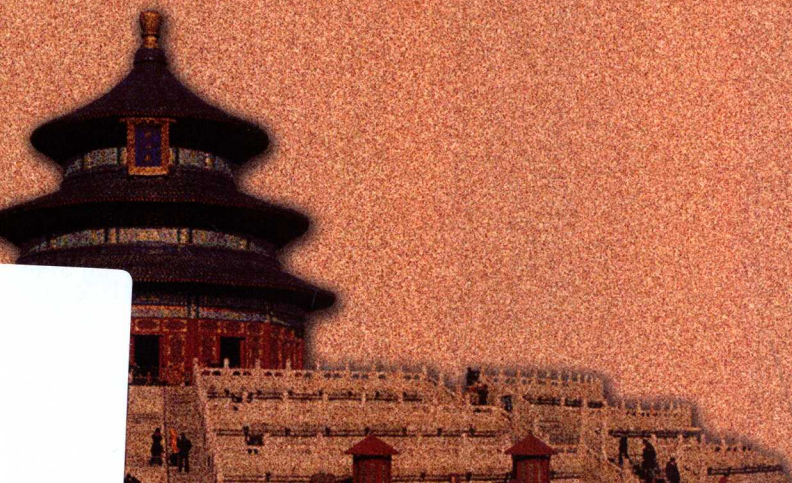




# 晚清 改革

—— 专论汇编

◎ 徐松荣 著



河南出版社



# 晚清改革

——专论汇编

徐松荣 著

银河出版社



书 名：晚清改革——专论汇编  
作 者：徐松荣  
责任编辑：亦 黄  
电子信箱：whges 05@21cm.com  
出 版：银河出版社  
地 址：香港铜锣湾邮政 31130 号信箱  
印 刷：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字 数：290 千  
印 张：14  
版 次：2014 年 7 月第 1 版  
201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国际统一书号：ISBN 978 - 962 - 475 - 482 - 7  
定 价：人民币 32.00 元

## 绪论——开篇的话

自古以来，尤其是近现代，“改革”、“革命”是一个美好的字眼，也是一句响亮的口号，人心向往着，步子迈得很大很快。可一回到晚清的历次改革就这么难，革命就这么不易。尤其是，你也称改革，我也叫革命，结果是殊不同归也不同。洪秀全发动太平军起义，建立了“太平天国”，冲击了清朝的反动统治，义和团抗击外国侵略者，又笼统排外，盲目滥杀“洋鬼子”，算不算真正意义上的革命，或称改革，应该说不算。他们虽然悲惨地失败了，但都对晚清改革、中国近代化加入了催化剂，唤醒了国民，惊醒了统治者。

改革是被逼出来的，世变推动改革。晚清正处在19世纪，世界走出中世纪，发生了一系列惊天动地的变革事件。西方资本主义高歌猛进，冲击着世界各个角落。他们要殖民，他们要开拓市场，他们要冲开一切闭关锁国的大门，把每个国家、每个民族纳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他们通过改革和革命，推出了先进的生产方式，缔造了先进的物质和精神的武器，并借助武力去攻克一切封闭的堡垒。世变、时变，促成改革与革命的时代潮流，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清朝统治下的中国同样避免不了。

危机催生改革。晚清伴随着民族危机、社会危机而发生的统治危机，十分强烈、十分紧逼。外国列强、周边强邻为了打开中国大门，吞食中国领土，侵犯中国主权，发动了一系列对华战争，一次比一次严重，民族危机空前。爱新觉罗王朝统治下的中国社会矛盾尖锐，民众反抗浪潮此起彼伏，尤其是太平天国运动引起的社会危机更加深刻。在国际、国内两种力量的强烈冲击下，清朝的统治江河日下，岌岌可危。晚清的改革，一次又一次推出变法新政，正是在这种危机四起的背景下发生的。

从秦汉到明清，中国是一个封建帝国，是一个农业社会，以皇权为中心的专制制度，以小生产、自给自足为特征的经济形态，以儒学为主体的保守主义思想文化，以家庭、宗法为基础的社会结构，四位一体构造中国传统。加上国民长久形成的思维定式：向后看，向祖宗看齐；向上看，唯皇权、官权是听；向内看，关起门来拒外，使这些传统根深蒂固，更加顽强。要改革，缔造新国家，要走向世界，走向近代化，而这些传统就成为强大的阻力。晚清改革就是一次又一次冲破这些阻力而展开的。从“更法”到“借法”，到“变法”，从办洋务到戊戌维新，到清末新政，经历艰难历程，发

生过多次曲折与反复。一批立志、立足改革的人物，从林则徐到康有为等，由于受传统文化的影响致深，也经历了反复与回归。晚清的改革史就是一部艰难曲折的发展史。

一段时期，由于受极“左”思潮的驱使，以阶级、路线划分人群、区分性质，判断是非，人为地把一种改革与另一种改革对立起来，结果是否定加否定，一切都被否定了。殊不知，任何一种社会改革，都是从低级走向高级，从一个阶梯上升到另一个阶梯，前一场改革为后一场改革创造前提条件，后一场改革在此基础上接续前进。虽然有否定，有破除，有曲折反复，错杂不齐，但都有一种继承与发展的关系。维新运动对于洋务运动，清末新政对于戊戌维新，就是这样一种关系，前者孕育了后者，并为之开辟了前进道路，奠定了物质的思想的基础，后者则向更高层次、更深层次、更广阔领域发展。

晚清改革，对于清政府来说没有成功，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只是延缓了清王朝的覆亡。对于中国的社会经济、思想文化却发生了巨大影响，发挥了积极作用，从这方面说，晚清改革为清王朝准备了“掘墓人”，为辛亥革命创造了条件。清王朝就是在改革与革命两种社会力量的冲击下灭亡的。所以，不能把改革与革命绝然地对立起来，虽然改革派与革命派有过对立，有过互相否定，这只是中国近代化的过程中纷繁错杂的现象，革命替代改革，是中国迎合世界潮流，向前发展，走向新生的反映，新世纪的曙光就是从这里升起。

本人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30余年，涉及中国近代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思想史的多个方面。晚清改革是其中的重要课题，发表专论数十篇。这里选取专论20篇，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论述了晚清改革，从多个方面论证了改革的艰难历程和纷繁复杂的局面。除了经济、政治、军事等重要领域，着力于社会改革、思想文化改革以及对外关系方面。

专论分4个部分。第1部分专论清政府主导、改革派倡导、参与的改革，是全书的重点。第2至第4部分，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历史事件与人物，论述多个领域里的改革及其艰难曲折的历程。每篇专论另加按语，以作进一步提示、说明、发挥。

借鉴晚清改革的历史，引发读者的广泛、深入思考，以推动当代中国的改革，使改革持续、深入、稳健地向前发展。这就是本书的宗旨与意愿。

作者，二〇一四年春于广州

# 目 录

绪论——开篇的话 .....	1
一、论鸦片战争前后的“更法”与“借法” .....	1
二、晚清改革：从“借法”到“变法” .....	10
三、同光新政与三次“变法”论纲 .....	24
四、论晚清三次变法新政的关系 .....	34
五、洋务派与戊戌维新——兼论洋务运动与维新运动之关系 .....	44
六、重论戊戌维新与洋务运动的关系 .....	54
七、《海国图志》与洋务运动 .....	62
八、徐继畲的和、战思想与外交活动述评 ——兼论鸦片战争时期的“战”与“和” .....	71
九、文化冲突与天国兴亡 .....	82
十、容闳与清末留学教育 ——兼论近代化的艰难步伐 .....	91
十一、论清政府与义和团运动 ——从己亥建储说起 .....	102
十二、清末三次办报高潮述论 .....	113

十三、辛亥前后国民性改造思潮述论 .....	122
十四、论梁启超的新民学说 .....	146
十五、再论梁启超的国民性改造思想 .....	155
十六、论康有为文化思想复归的根源与轨迹 .....	163
十七、略论郑观应的外交思想 .....	176
十八、袁世凯简论 .....	185
十九、略论近代中国农村地权形态的演变与趋势 .....	197
二十、略论晚清珠江三角洲土地关系与租佃关系的变化 .....	204

# 一、论鸦片战争前后的“更法”与“借法”

**按语：**在鸦片战争前后的特定历史背景下，揭开了晚清改革的序幕。从“更法”，即变更旧制、整顿旧法开始，在新形势下又转向“借法”，即学习和取法西方。学习、借法西方，从上、下两个层面展开，从而引发了太平天国运动和洋务自强运动。本文着重论述更法与借法的理论、实践与特点，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本文除了在《广东社会科学》杂志上发表，还在其他刊物上多次转载。

鸦片战争前后的改革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从“更法”开始，又从“更法”转向“借法”，揭开了晚清改革的序幕，初现近代中国改革的新动向、新特点。

## 一、改革思潮与更法

鸦片战争前后，清朝统治危机四起，外国入侵与农民起义同时迸发，改革思潮应时而生。

首先，清朝统治下的中国，社会矛盾不断激化。土地兼并加剧，租税剥削加重；统治集团腐败，贪风盛行；八旗、绿营官兵腐化，统治支柱濒临崩溃。与此同时，人口急剧增长而相对过剩，爆炸性的人口增长与清朝的闭关禁海政策发生尖锐矛盾，过剩人口无法移民出国，移民新大陆，移民到东北、内蒙、新疆地区也受到限制，内地生存空间狭小，加上自然灾害流行，造成流民、灾民遍地，更加激化了各种社会矛盾。正如龚自珍所揭示的，“至极不祥之气，郁于天地之间”<sup>①</sup>；“起视其世，乱亦不远矣”；“‘山中’之民有大声音起，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矣”<sup>②</sup>。劳苦大众与统治者的矛盾已经不可调和，一场反抗爱新觉罗王朝的风暴正在酝酿发动。一批有识之士为此忧心忡忡，呼吁改革，挽救危机。

其次，鸦片战争显露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强行打开中国大门，迫使中国卷进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从此，中、西方在各个方面的冲突全面展开，也激化了中国社会内部的各种矛盾，引起社会各阶层的分化和社会关系的重新组合，促成制变、救时、革新思潮的兴起。



再次，在内外矛盾加剧的影响下，思想、文化领域发生新变动，催生了改革思潮。第一，儒学演变与学术新思潮。以龚自珍、魏源、贺长龄为代表，上继庄存与、刘逢禄，复兴今文经学，强调联系现实，倡导变通改制之学说。龚自珍阐发“易世而变”、“随时应革”的主张<sup>③</sup>。魏源提出“因时制变”、“因革损益”的理论<sup>④</sup>。第二，经世致用思潮与经世派。士大夫中以陶澍、林则徐、贺长龄、龚自珍、魏源、徐继畲等人为代表，声气相连，互相砥砺，形成影响朝野舆论、决策的经世派。这批有识之士“通时务”，“慷慨论天下事”，讲求“经国济世”之学。指出“学无大小，以适于用者为贵”<sup>⑤</sup>；“学问经济无二事”，“学术与治术合而为一”<sup>⑥</sup>。经世之学以“通经”、“致用”、“变古”、“救时”为旨归，解决现实问题。第三，社会、政治弊端与中外冲突，引发士大夫浓烈的忧患意识。龚自珍、魏源等人的诗文、言论最具代表性。龚自珍谴责统治者的思想文化禁锢、滥加搜括和日趋腐败，呼唤改革的“风雷”。魏源的诗文多是忧时愤世之作，他自称是“荆楚之南”的“积感之民”，忧河防水患、漕变盐患、海防边患，愤吏治腐败、人才虚、人心寐。但他积极应对，以作“前驱先路”<sup>⑦</sup>。第四，形成比较系统的社会批判思想。龚自珍的《明良论》、《尊隐》、《平均篇》、《病梅馆记》、《己亥杂诗》等，魏源的《古微堂集》部分篇章及众多诗文，曾国藩的《备陈民间疾苦疏》、《应诏陈言疏》等，都是代表作。此外，经世派、改革家们对传统的贵义轻利思想、重本抑末政策，逃避现实的考据、训诂之学，以及士大夫的愚昧无知、妄自尊大，都进行了批评、谴责，甚至涉及到孔孟儒学的弊端。如汪士铎等人不仅指责程朱理学，也批评孔孟儒学仅是“浮夸大言”，作“想象之空谈”，“长于修己，短于治政”<sup>⑧</sup>。

伴随着社会政治、中外关系、思想文化领域的新变动，紧接着是更法、革新口号的提出。更者，变更、变通、整顿；更法者，因时制变，更新法度，除弊救世。

“更法”的首倡者是龚自珍和魏源。龚自珍倡言：“自古及今，法无不改”<sup>⑨</sup>，“一祖之法无不弊，千夫之议无不糜。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sup>⑩</sup>。又说：“仿古法以行之，正以救今日束缚之病。矫之而不过，且无病，奈之何不思更法”<sup>⑪</sup>。

魏源则指出“法久弊生，因时制变”，“天下无数百年不弊之法，无穷极不变之法，无不除弊而能兴利之法，无不易简而能变通之法”<sup>⑫</sup>；“五帝不袭礼，三王不沿乐”<sup>⑬</sup>，“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可则因，否则革”，“新则袭之，弊则益损之”<sup>⑭</sup>。

除龚、魏外，包世臣提出“修法”的主张，指出“修法以劝农”，“本末皆富”，应作为“千古治法之宗”，“子孙万世之计”<sup>⑮</sup>。王夔认为“自古无不弊之法，要恃有随时救弊之人”；“既有治人，必有治法”<sup>⑯</sup>。此外，一批经世派人物如陶澍、吴铤、汤鹏、黄爵滋、管同、谢阶树、徐鼐、丁晏、许乃济、孙鼎臣、

许楣、汪士铎、冯桂芬、王茂荫等，都从不同角度、不同领域提出了更法、改革的主张与建言。从清廷到地方督抚，亦开展了更法改革的活动。

## 二、更法的特点、理论与活动

更法者，“自改革”，“变更祖宗成法”，侧重于整顿“旧法”，革除弊政。它具有以下特点。

首先，“变易论”是“更法”的理论前提。龚自珍根据今文经学三世说，强调顺应时变，革除旧法的弊端。魏源指出历史的发展是“自变”、“白化”（必然性），强调时势不同了，“圣人主事无不根底于民依，而善夫时势”<sup>①</sup>，“小变则小革，大变则大革”<sup>②</sup>。

其次，变法不变道，不离经，仿古法而行之。龚自珍说：“无八百年不夷之天下”，但“有亿万年不变之道”<sup>③</sup>。魏源亦说：“其不变者道而已”<sup>④</sup>。依据经说而“更法”，并依赖皇帝与权臣“更法”，没有摆脱“皇权变法”的传统模式。龚自珍等人更强调托古改制，即师古、仿古、法古。龚说“仿古而行之”<sup>⑤</sup>。“何敢自矜医国手，药方只贩古时丹”<sup>⑥</sup>。胡培恽亦指出：“善法古者，不袭其迹，惟其意”；“古制之不存于今日，而其法未尝不可师而用者”<sup>⑦</sup>。

再次，坚持渐变，反对骤变。龚自珍认为“风气之变之必以渐也”，于是说“（法）自改革”，“可以更，不可以骤”，“随其时而调济之”<sup>⑧</sup>。魏源即说：“立能行之法，禁能革之事，求治太速，疾恶太严，革弊太尽，亦有激而反之者也”<sup>⑨</sup>。亦指出：“政未熟而急求治，治必乱；化未熟而急变俗，俗必骇；虑未熟而急图功，功必阻；德未熟而急知名，名必辱”<sup>⑩</sup>。

最后，更法的目的在于“除弊”、“兴利”、“救时”，“以实事程实功”，解决现实问题。

鸦片战争前后的更法理论与活动涉及到经济、社会、政治、教育、对外关系等多个方面。

其一，重农兴农，限田均田，养民救灾。龚自珍提出“农宗论”和“平均篇”，包世臣提出“农本论”，吴铤提出“均田限田说”，魏源提出“守本论”和“保富说”，谢阶树提出“保富说”和“重农论”，汤鹏提出“力农论”，徐鼐提出“务本论”，胡培晕提出“井田论”，汤成烈提出“屯田论”。龚自珍、谢阶树的主张，以及冯桂芬的“复宗法论”，都力图恢复和强化宗法制度，解决农业、流民问题。包世臣既主张“本末皆富”，也强调“天下之富在农”。吴铤提出“均田”、“限田”，旨在遏制土地兼并。指出“为政之道，莫先于定田制”，“欲定田制，莫如行均田法而去其弊。限民田无得过五十亩，则为者多矣”<sup>⑪</sup>。林则徐、龚自珍等人还提出开放边疆、移民殖边、发展农耕。这些主张以仿古、复古的办法解决农村社会问题，新意不多，创意更少。

其二，整治三大政：治河、漕运、盐务。三大政到嘉道年间出现严重危机，对此，朝野上下议论最多，实行了较多改革。治河，兴修了一些水利工程，但成效不大。漕运、盐务改革成效大，漕运最终实现了由河运改海运、由官运变商运的转变。推行盐法改革，包括裁减浮费，定场价，简化销盐手续，创行盐票（改纲盐为票盐），实现了盐的生产、运销、管理制度上的变革。

其三，财政、币制、租赋改革。魏源、包世臣等人提出除弊、兴利、节用、开源、屯垦等主张，并突破“重义轻利”的传统信条，认为“理财为古人致治之大端，尤此时当务之最急”<sup>②</sup>。此外，有吴铤、王夔、谢阶树提出保富说、理财论，林则徐、黄爵滋等人也提出改革财政、币制。后来，徐鼐、许楣、冯桂芬、雷以诚、王茂荫等，都立足于国计民生，增加国用，解决财政困难，提出了改革财务、货币、租税制度。清政府即借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发生的“库案”，清查库款，追缴亏空的田赋征收，惩办贪污官吏。同时整顿地丁钱粮，开办捐输以助饷银、助赈济，整理、开发银矿。这一时期，针对银荒和银贵钱贱，货币改革思想最为活跃，提出了多种主张。包世臣主张“专以钱为币”，“使银从钱”，发行纸币，但要“虚实相权”<sup>③</sup>。魏源坚持银币论，反对废银行钞。许楣亦坚持金属主义货币论，反对废银行钞和发行不能兑现的纸币<sup>④</sup>。王夔则主张废银行钞，发行纸币。冯桂芬提出“用钱不废银”，主张民间交易“一概论钱”，但反对铸大钱。王茂荫提出“以实运虚”、“似实而虚”论，主张发行能够兑现的纸币，金币、纸币同时流通，“虚实兼行，商民交转”<sup>⑤</sup>。此外，林则徐、徐鼐、丁晏等人也提出自己的主张，讨论货币问题。道光、咸丰年间，清政府对货币实施改革，有成功，也有失败。

其四，整顿吏治，变更教育、考选制度。林则徐、魏源、龚自珍、黄爵滋、冯桂芬、王茂荫等人针对旧式教育与科举、保举、捐纳制度，提出了批评与建议。魏源指出更法改革首在人才，“不难于立法，而难得行法之人”<sup>⑥</sup>。他要求革除科举的弊端，不能以“书小楷，诗八韵，将相文武此中进”<sup>⑦</sup>。应于“武试增水师一科”。改革教学内容，培养“经世致用”人才。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设有多篇，进一步主张废八股，改科举，变更选举制度。提出工艺“特设一科”，优者“赏给举人”，“赏给进士”。

其五，改良社会，涉及禁烟，完善宗法制度，解决人口问题等。以禁烟首当其冲。怎样禁烟，如何对待吸食者，如何处理中外关系，讨论激烈。如丁晏对严禁派的两种错误主张：中外禁绝互市（断绝贸易往来），处决鸦片吸食者，提出批评，认为“禁烟当以民命为重，不当计利；立法当以中国为先，不当扰夷”<sup>⑧</sup>。改良风俗，包括官场、学术界风气和民间风俗。不少人提出“正风气”，“变风俗”，多是老调重弹。改良社会组织，多是主张完善和强化宗法制度。

针对人口过度增长造成的社会问题，龚自珍、魏源、汤鹏、冯桂芬等人都有议论，并提出解决办法。封建士大夫缺少世界观念，很少有人提出解除海禁，

让国民走出国门，扩展生存空间。提出的办法大多是发展生产安抚流民，移民边疆减少内地人口压力。而以汪士铎提出的人口论最为尖锐，指出：“人多之患”、“人多之害”，在于“穷”、“愚”、“乱”。“人多则穷”，人民的贫困在于人口过剩，“天地之力穷矣”。“人众而愚”，缺少教养而愚昧。“人多致乱”，“人满而吏堕，……农安其乡不足自存活”，于是酿成“祸乱”。怎样解决“人多之患”，他提出了减民说，有的方法可取，有的则是极端手段，违背人道和常理<sup>⑤</sup>。

其六，发展工矿业、商贸业。魏源提出“末富”的富民说，“缓本急标”的重商论，要求发展商品经济。还提出货币财富论，要求大力开采银矿，发展外贸导引洋银内流，以增加银通货，同时提出发展民族工业。包世臣提出“本末皆富论”，认为“生财者农，而劝之者士，备器用者工，给有无者商”；“无农则无食，无工则无用，无商则不给。三者缺一，则人莫能生也”<sup>⑥</sup>。于是，他主张实行农、工、商业同时发展的经济政策。

其七，改良武装，增强国防。林则徐主张海防、边防并重，也强调海防，提出建设近代海军的设想。魏源提出比较完整的海防思想：议守、议战、议款；攻夷、款夷、制夷；建设近代国防思想：“师夷之长技”，设火器局造船炮；“善师四夷”，以西法练兵养兵；建设海军，增设水师科，培养海军人才。龚自珍重视边防，最先提出新疆建省。

鸦片战争后清廷继续推行更法措施。其重点是：严禁令，重法纪，整顿吏治，如罢逐穆彰阿，处置耆英，重新起用林则徐。整顿财政，革除弊端，如设官钱局，发行纸钞，改铸大钱；减八旗俸饷，破八旗世袭的供俸旧制；试行厘捐，解决军饷。整顿科场，重用才识之士，不计门第、身份、祖法，起用汉人，如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等。这些措施，对拯救统治危机、社会危机曾起过一些作用，但点滴的“更法”改革应付不了空前的“大变局”，必须“借法”。

### 三、新形势与“借法”思潮

从“更法”转向“借法”，始于鸦片战争后，是在中外关系大变动、大变局，中西经济、文化交流扩大的新形势下发生的。

“变局论”浓缩和概括了从“更法”转向“借法”的历史背景。鸦片战争引发了“古今大变局”的到来，战后五口通商，国门被打开，既打破了清朝与世隔绝的闭关政策，也冲击着国人妄自尊大、蒙昧无知的落后观念。一批比较清醒的官僚士大夫开始放眼世界，了解、研究域外情势，认识了东西方的差距，表达了向往和取法西方的思想趋向。徐继畲最先提出“古今一大变局”的命题<sup>⑦</sup>，林则徐、魏源、姚莹等人亦有同样认识，并提出“师夷之长技”的全新主张，使他们成为学习、取法西方的先驱和开启者。



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和第二次鸦片战争接踵而来，进一步促成了“大变局”。“大变局”震醒了部分国人，包括部分官僚士大夫和乡村知识分子。前者以冯桂芬、曾国藩、李鸿章为代表，后者以洪秀全、洪仁玕为代表，都认识了大变局形势。为应对“大变局”，开始采取“借法”西方的实际行动。这就是后来的太平天国运动和洋务运动。

“大变局”与中西方经济、文化交流扩大，对“更法”向“借法”演进创造了历史条件。

首先，战前的商馆、战后的洋行以及外商和附属于他们的买办（尽管前后性质不同），作为中西经济交流的桥梁，最早引进西方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关系和商品经济思想，引起经济领域的新变化。可以说，他们是借法西方、师夷长技的最早实践者。如广州十三行商馆大量仿造彩瓷（洋瓷）、火轮船、水雷、洋枪、洋炮、火药、摄影机等<sup>⑧</sup>。如鸦片战争时期，伍敦元、潘绍光出资购买外国夹板船，潘仕成自觅良匠造战舰，雇觅洋匠配置火药，制造水雷，潘世荣雇觅洋匠仿造火轮船<sup>⑨</sup>，帮助清军抗击英军入侵。

其次，西方教会与传教士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除了传教，还从事教育、出版、新闻、行医等活动。如出版了《英华辞典》等词书，《西游地球闻见略传》、《大英国统志》、《美理哥志略》等著作，《察世俗每月统纪传》、《中国丛报》等中外文报。从宣传接种牛痘、预防天花开始，到在澳门、广州、上海创办医院，开设药房药厂，出版医药著作。开始引导、吸收华人赴欧美留学，容闳、黄宽、黄胜是我国最早的留学生。此外，外国商人及科学家、艺术家、驻五口领事，对西学东渐也发挥了较大作用。

再次，国人开眼看世界，研究了解西方，撰写出版了一批著作。从谢清高的《海录》，陈伦炯的《海国闻见录》，潘飞声的《西海纪行》，到梁廷枏的《海国四说》，林则徐的《四洲志》，姚莹的《康輶纪行》，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畲的《瀛环志略》，夏燮的《中西纪事》，达20种之多。其中以《海国图志》、《瀛环志略》的影响最大。这些著作对于打开中国人的眼界，打破陈腐的历史偏见，更新世界观念，推动国人走向世界，发挥了重要作用。

大变局与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促成“更法”向“借法”演进，并形成一股社会思潮。

借法者，借鉴、仿效、取法。但这里的“借法”专指借鉴外国，取法西方。“借法”西方是从批判闭关政策和蒙昧主义开始的，是在与传统的保守势力、封建顽固派的激烈冲突中展开的。

“借法”西方的社会思潮在朝野上下、各个社会层面有着不同的反应。鸦片战争使部分官僚士大夫清醒过来，以林、魏、徐、梁、夏、姚等人撰写的西方史地著作作为突破口，反思以除弊兴利为主要内容、以借鉴古代更法为主要方式的改革，能否解决西方列强入侵、自强御侮、门户打开后西学东渐、中外关

系大变动的新问题。为此，他们勇敢地面对现实，提出了对外开放、借法西方的主张。战后，清朝的统治政策也开始转向，从重在治内（更法除弊）到强调治外（筹海制夷），既要除弊兴利，也要自强御侮。在西学东渐的影响下，下层社会开始“骚动”起来，下层民众也希望从西方寻求解放自己的思想武器。于是，不同社会层面的代表人物，各自提出了不同的理论主张，发动了与往昔不同的新运动。

### 四、借法的理论、实践与影响

提出借法西方的理论，并付诸实践，是从两个层面展开的，一是经世派、开明官僚士大夫，二是乡村学子、下层民众。他们借法西方的目的、目标不同，甚至绝然相反，但共同赋予了时代新内容，近代社会的演变也就从这里开始。

经世派、开明官僚倡导对外开放，学习、借法西方，始于筹海制夷，抵抗侵略。“师夷之长技”是初期借法西方的主要口号，代表人物首推林、魏，次则徐、姚。

林则徐从领导禁烟、抗击英军入侵，到鸦片战争挫败的教训中开始了新的认识，于是他主张了解西方国家，学习、效法西方的长技，发展工矿业，筹建海防。

魏源是“更法”论者，也是“借法”论的首倡者。他面对“千年之变局”，冲破“夷夏大防”的顽固传统思想，发出非同凡响的时代强音：师夷长技，学习西方。针对顽固派的攻击，指出“礼宾外国，是王者之大度；旁咨风俗，广览地球，是智士之旷识”；“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sup>①</sup>。其所著《圣武记》首次提出“尽转外国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富国强兵”<sup>②</sup>。《海国图志》是他学习、借法西方的代表作，对师夷、借法西方提出了许多具体建议。如聘请外国技师造船练兵；“师夷之养兵练兵之法”，建设水师，筹建海防；改革教育、科举，培养新式人才；引进科技，发展民族工矿业；仿照西方法制革除时弊，改良政治；设译馆，习外交，扩大中外交流。

徐继畲根据“夷务”的需要，编纂《瀛环志略》，对欧美各国的史地、工商业、科技、议会民主政治作了详尽描述，认为“创古今未有之局”，表达了向往之情。同时指出世界是多元的，中国必须接受西方的挑战，必须借法自强。

姚莹强调了解、研究西方，抨击那些无知虚骄、自命清高、平居大言、拒谈夷事、守旧不变的顽固士大夫。所著《康輶纪行》，同样表达了借法西方的愿望。

魏、徐、姚等人的著述、主张和呼唤，初始并未引起统治者的重视，但被后来的洋务派官僚和理论家所继承和发展。初期“借法”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议论、倡导，只涉及低层次的技艺器物，目标立足于筹建海防，抵御侵略。随

着时势的发展和御外的需要，借法的范围与目标不断扩大。从师古更法转向师夷借法，向西方寻求救国、改革方案，这是中国破天荒的创举，在当时具有极强的挑战性。时代潮流不可阻挡，中国终于从“自修自强”发展到“借法自强”的洋务运动。并且形成新的社会集团和政治派别——洋务派。初期代表人物是冯桂芬和曾国藩，随后奕訢、李鸿章、左宗棠、王韬等迅速崛起。

冯桂芬和魏源一样，既是“更法”论者，也是“借法”论者，积极地主张学习、借法西方。冯的借法改革思想形成于鸦片战争后的四、五十年代，集中表述在1861年刊行的《校邠庐抗议》。该书半论“更法”，半论“借法”，论借法专设了《采西学议》、《制洋器议》、《善驭夷议》、《借兵俄法议》、《上海设同文馆议》等。他提出复“古法”，又提出师“蛮貊”。其言曰：“法苟不善，虽先古，吾斥之；法苟善，虽蛮貊，吾师之”<sup>③</sup>。目和很明确，即“始则师而法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自强之道，实在乎是”<sup>④</sup>。冯借法西方，强调的是“采西学”，“制洋器”，“辅以诸国富强之术”<sup>⑤</sup>。首在发展军事工业，后也涉及到仿效西方发展工商业、农矿业，用西法除蔽，如改官制，变科举，培养经世、实用人才。

此后，洋务派的头面人物大力倡导学西方，借法自强。奕訢声称“识时务者，莫不以采西学，制洋器为自强之道”<sup>⑥</sup>。曾国藩进一步提出“资夷力”，“师夷智”，“精通其法”，“以徐图自强”的主张，并首创军械所、机器局，发起洋务自强运动。随后的李鸿章、左宗棠等人亦是借法自强运动的倡导者和实践者，影响更大。洋务自强运动的兴起，终于迎来了一个新时代。

以洪秀全、洪仁玕为代表的下层学子也“借法”西方，领导农民起义，建立普罗大众的理想“天国”。太平天国“借法”分前后两个阶段，前期以洪秀全为代表，后期以洪仁玕为代表。

洪秀全学习、借法西方，借的是意识形态，是洋教，是基督教的“唯一真神”上帝，并借此创立了中国化的拜上帝教。借用西方的意识形态改造中国，是一大创举，是近代国人学习、借法西方的首次尝试。其启发意义很大，突破了国人、尤其是士大夫的思维定式和法古传统，引导人们把眼光投向世界，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但是，洪秀全借用的是中世纪的、过时的宗教神学，引进的是神灵上帝，违背时代潮流，也与中国的正统文化形成尖锐对立而发生激烈冲突。科学在不断进步，民主、人权已成为近代社会解放的标尺，如果再照搬西方中世纪的旧神学来改造中国，建立政教合一、神权统治的国家，失败是必然的。

洪仁玕早年参与过创立拜上帝会，宣传过洋教、上帝。但进入香港后，广泛接触西方的社会和科学思想，冲淡了他的宗教神学观。《资政新篇》是他学习、借法西方新的产物，主张效法西方资本主义改造太平天国，但遇到阻力，无法推行。在学习、借法西方的认识和实践方面，洪仁玕的思想仍然有很大的

局限性，但不失为先进人物。

太平天国把近代农民起义与学习、借法西方结合起来，既是创举，又是勉强的、矛盾的。他们离开中国国情，违背时代潮流，盲目引进而最终破产、失败。这对于后人学习、效法西方有教训，也有借鉴意义。学习西方学什么，借法西方借什么，今天仍然值得思考与讨论。鸦片战争后“借法”思潮的涌动，以及社会上层、下层的实践活动，开启了学习、借法西方的大门，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

注释：

①②③ 龚自珍：《定庵文集》，卷上，平均篇；尊隐；明良论。

④⑫⑬⑰⑱⑲⑳㉑㉒㉓ 《魏源集》，中华书局，1983年，第48~59、431、48~48、411、414、45、31、46、675页。

⑤ 夏炯：《夏仲子集》，卷一。

⑥ 邓淳：《强学堂序》，见《国朝岭南文钞》，卷十五。

⑦⑩⑪ 魏源：《海国图志》，卷二十六；卷二十六；卷二十四。

⑧⑳ 汪士铎：《乙丙日记》。

⑨⑩⑪⑰⑱⑲⑳㉑㉒㉓ 《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317、5~6、35、35、7、13、13、79页。

⑭ 李瑚：《论魏源》，《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1期。

⑮ 包世臣：《安吴四种》，庚辰杂著二，同治壬申注经堂重刻本。

⑯ 王夔：《钱币刍言》，钱钞议。

⑰ 魏源：《圣武记》，卷七，中华书局，1984年，第296页。

⑱ 胡培：《研六室文钞》，井田论，光绪戊寅秋八月世铎楼刻本。

⑳ 吴铤：《因时论》，十一，均田限田，《皇朝经世文编》，卷五五。

㉑㉒㉓ 包世臣：《安吴四种》，卷七，说储上篇前序；卷二六，致前大司马许太常书，再答王亮生书。

㉔ 许楣：《钱币论》，钞利条论十八。

㉕ 王茂荫：《王侍郎奏议》，卷六，再议钞法折。

㉖ 丁晏：《书包倦翁（安吴四种）后》，见盛康《皇朝经世文续编》，卷十二，思补楼刻本。

㉗ 徐继畲：《瀛环志略》，凡例。

㉘㉙ 蒋祖缘：《清代十三行吸纳西方文化的成就与影响》，《学术研究》1998年第5期。

㉚ 魏源：《圣武记》，光绪四年上海申报馆排印本。

㉛㉜㉝ 冯桂芬：《校邠庐抗议》，收贫民议；制洋器议；采西学议。

㉞ 《总理各国事务奕訢等折》，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二），第24~25页。



## 二、晚清改革：从“借法”到“变法”

**按语：**从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到二十世纪初年，晚清改革从“借法”转变到“变法”，且渐入高潮，经历了三个阶段。本文分三部分，从三个方面论述晚清改革变法的时代背景，借法到变法的转变过程，变法的三个阶段及其不同特点。内容重点论述：世变危机，催生了晚清变法，改革变法力量的成长和壮大，从“借法”到“变法”转变的艰难历程与持续论争，晚清改革的时代特色，变法的渐次推进、三个阶段及其关系。本文除发表在《广东社会科学》杂志上，还入编了论文集。

六年前，本人发表了《论鸦片战争前后的“更法”与“借法”》一文（见《广东社会科学》2006年第一期），论述了晚清前期（从鸦片战争到洋务新政初期）改革的路径、特点及艰难历程。本文接续上篇，重点论述晚清后期的改革：从“借法”到“变法”，涉及其动荡的时代背景，转变的曲折过程，演进的三个阶段及其时代特色。

### 一 世变、危机，催生变法

世变、危机，催生了晚清变法。

从“变局”论到“世变”论，是晚清改革家<sup>①</sup>对时局大变动的集中概括。

晚清前期，改革家们强调的是“变局”论。早期，由徐继畲提出“古今一大变局”<sup>②</sup>，魏源、裘自珍、林则徐、姚莹、黄钧宰、夏燮等人亦有相同认识。后来，从李鸿章、丁日昌、郭嵩焘、曾纪泽等洋务官员到冯桂芬、王韬、薛福成、郑观应等改革理论代言人，以及奕訢、桂良等朝廷实权人物，都阐述了“变局”论。据统计，晚清提出“变局”言论的达60多人，其中王韬、薛福成、郑观应等人的变局言论多达10次以上<sup>③</sup>。李鸿章尖锐指出：中国时处“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遭遇“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sup>④</sup>。薛福成直言：“古今中外之势，古今之变局也”<sup>⑤</sup>。郭嵩焘亦言：“西洋之入中国，诚为天地一大变”<sup>⑥</sup>。曾纪泽在日记中写道：当今“开千古未曾有之局，盖天运使然，中国不能闭门而不纳，束手而不问”<sup>⑦</sup>。郑观应一再论及：“尤属古今之变局”，“乃中国非常之变局”。一批有识之士还用“春秋战国”诠释变局的特征。“变局”论既是反